

外交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薛福成思想对观

方炯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我国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象与特征已有诸多讨论,但在论及大变局的本质时仍存在不足,外交思想史的研究路径有利于充分揭示大变局的由来与全貌。晚清“同光中兴”时代,大变局概念首次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学术话语,其中,两位清朝驻外使节郭嵩焘与薛福成的变局观具有可比性。郭、薛二氏分别从文明转型与权力竞争的视角发展自身的思想体系,其问题意识和结论均与当代有共通之处,为思考新一轮大变局提供了母题,有助于增进对大变局多义性、长期性与目标性的理解。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文明转型; 权力竞争; 郭嵩焘; 薛福成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21] 12-0174-08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1.12.027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首次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论断以来,我国学界已就此次大变局的现象与特征开展了诸多探讨。然而,与之相比,学界对大变局本质的探讨数量甚少,且远未达成共识,甚至就连“百年”时间段的指向、变局的内涵范围等基本问题,在学界都缺乏共识。^①既有的研究或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为主,或是从结构性视角出发的因果分析,在面对概念本身时均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思想史研究在概念阐释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②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与薛福成曾就回应19世纪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的思考可以为当代的大变局研究提供镜鉴,应当对其中蕴含的问题意识与中国视角进行充分发掘。

一、晚清驻外使节思想比较在大变局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

大变局作为一种概念与问题意识,至迟在晚清即已产生,这构成了运用思想史路径对大变局开展研究的基础。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黄钧宰即提出“古今之变局”概念,重点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由隔绝阻滞转型为“中外一家”的重大变迁。^③继之,徐继畲强调,中国周边原本独立的政权皆被欧洲各国殖民统治,乃是“古今一大变局”。^④李鸿章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的奏章进一步指出,西方国家“胥聚于中国”的形势,当属“三千余年一大变局”。^⑤同治十三年(1874),在论证加强海防的必要性时,李鸿章又提出中西“客主之形”已经发生变化,堪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观点。^⑥

由以上摘录可见,晚清大变局的核心议题,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战略环境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以及中国处理自身历史经验方式的转变。^⑦这一核心议题与当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同构。由核心议

收稿日期:2021-02-21

作者简介:方炯升(1995—),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

^①参见朱锋《近期学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综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7期;凌胜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术争论与战略意涵》,《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6期。

^②石斌《再思国际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③黄钧宰《金壶七墨(选录)》,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23-624页。

^④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⑤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⑦费正清对此有精辟论述,参见[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6页。

题所生发的国家间竞争、国际秩序变迁、中华文明的演化创新,以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张力等典型问题,在晚清与当代也均已得到思想者的关注与剖析。^①诚然,晚清大变局下的时代特征和政治环境与今日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思想者面对大变局时的思维方式存在本质性的差异。^②尽管时移世易,但两场大变局中思想者为中华民族由衰微走向振兴的理想信念一以贯之。^③因此,回归晚清大变局中思想者对上述典型问题的探索,从思想史的视角对今日之大变局进行剖析,无疑是有价值的,有利于为大变局的应用型研究提供具有人文积淀与中国关怀的补充与创新。^④

当前,史学界与政治学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对大变局思想史根源的分析当从较小的切口入手,以点带面。从国际关系学的特色出发,分析清朝驻外使节对大变局的思考与探索,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议题。

清朝驻外使节群体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颇具独特性。他们是统治集团之一员,出使前一般身居高位。相较于普通知识分子,他们对大变局的全貌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更加深沉的忧思。同时,他们长期居住外国,有较多的机会参观考察或与外国政治人物接洽,更加深入地理解当时中国所面对的列强之本质特征。

郭嵩焘与薛福成是驻外使节群体中的典型人物,其经历的相似性进而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两人都与洋务重臣曾国藩有密切的往来,在出任使节前均曾担任海疆省份的地方主官,在第一线主理洋务,甚至参与战事,对彼时中国核心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与内政外交状况有深刻体察。^⑤他们出为使节的时间相仿,均处于甲午战争前号称“同光中兴”的相对平稳时期,彼时中国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尚未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他们同赴西欧执行使命,出使期间活动的空间也相近。^⑥更重要的是,郭、薛二氏均承认并关切大变局的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将此战称为“自古以来夷祸一变局也”^⑦。出使欧洲途中,面对西方对于亚洲的殖民,郭嵩焘又不禁感慨“此实前古未有之局也”^⑧。薛福成则在其进身之文《上曾侯相书》中指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⑨。在共同的问题意识引导下,郭嵩焘与薛福成均针对大变局发展了自成体系的观点。^⑩然而,尽管二人经历相似,他们的思想取向却呈现出较强的差异性,有必要加以对比和考辨。

二、郭嵩焘之出使与对大变局的“文明转型”思考

诸多研究郭嵩焘的论著都引用了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的一段话: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嗟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⑪

梁启超的叙述,揭示出郭嵩焘的变局观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巨大差异。郭嵩焘承认,西方国家同中国一样拥有道统,甚至更进一步认为西方的道统优于中国的道统。这种对大变局的看法,可以用“文明转型”来概括。

在出仕前期,郭嵩焘便对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有独到的判断。他是曾国藩的青年好友,曾参与曾氏组建湘军的事业,并较早在上海与西方人接触。^⑫或许正是这些经历令郭嵩焘敏锐地认识到,西人与中国历史上的

①许纪霖《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②徐勇、张慧慧《“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叠加及应对》,《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0期;任剑涛《社会变迁的时间尺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俞祖华、江洋《近代以来三次历史大变局与中华文明的衰而复振》,《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④陈玉聘《诗与思: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4期。

⑤郭嵩焘曾担任广东巡抚,在任上处理诸多涉外事务;薛福成则曾担任宁绍台道,参与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战。与他们相比,同期其他较有影响力的驻外使节如曾纪泽、陈兰彬、刘锡鸿、何如璋等,在出使前均未担任地方主官,这也更加突出了郭、薛二氏比较的价值与不可替代性。

⑥郭嵩焘于1876—1879年担任驻英公使,1878年起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于1890—1894年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

⑦《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页。

⑧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⑨《上曾侯相书》,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⑩有学者指出,与同期其他驻外使节相比,郭嵩焘与薛福成的思想是最具有体系性的。参见吴微《外交实录与古文新变——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⑪原文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0页。引用时标点略有修订。

⑫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30页。

“蛮夷”有极大的区别,决不可轻视。他的这一正确认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即有充分体现。咸丰九年(1859),郭嵩焘以翰林身份,随亲王僧格林沁参赞天津防务。其时英法使节以换约为名,率炮舰进抵大沽口。僧格林沁与怡亲王载垣等“奉旨密商”,制定了如果西人换约“不守规矩”,即令官兵假扮乡勇偷袭的计划。郭嵩焘当场反驳两位亲王,认为“凡事须是名正言顺”,外交中不应出此诡计,却未被采纳。^①僧格林沁按此方案与英法联军作战取得胜利,清廷将此次战役视作面对西方的重大战绩,但未曾料想到次年8月,英法组织强大兵力报复,僧格林沁屡遭败绩,终致北京被攻陷,咸丰帝出奔热河。彼时已经离开前线的郭嵩焘,在知情后怒斥僧格林沁“不学无术”,甚至直言“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②

郭嵩焘并未停留在对军事失败的直接批评,而是强调战争背后有更加重要的“理”之转移与变迁。郭嵩焘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权力形势的对比,只是“一时所不能违者”,并不构成战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战事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决策者违背了万世所不能越之“理”。郭嵩焘通过与西人的接触,指出西人“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完全可以与其公开谈判协定,按协定办事。面对西人,本应“以理自处”,使“理足于己”,但朝廷一味运用武力,“欲以刚相胜”,终于招致祸患。^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彻底突破清朝传统的朝聘制度,由“蛮夷”登堂入室成为“洋大人”。^④创巨痛深的清朝决策者开始感受到大变局的必然性与痛苦性,但能够如郭嵩焘一般以文明转型思路看待大变局的士人尚为数不多。郭氏将战争的失败归于“理”之未尽,也即承认西方国家具有与中国相同或相通的“理”,甚至更进一步暗示在面对西方时,中国的“理”是不足的。这在以政教立国的传统王朝之中,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观点。^⑤其后,郭嵩焘受擢拔出任广东巡抚,他自称在广东常言“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其原因则在于“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理路之可循也”。^⑥对中西文明的直白对比,进一步凸显出郭嵩焘文明转型的变局观在晚清的尖锐性。

郭嵩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彰显出其耿直甚至执拗的书生本色。他自负于自己的学识与见解,对于人情世故不甚顾惜,这也导致他不能见容于时局。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自广东巡抚任上去职闲居,直到同治末年才再次复出。恰逢光绪改元(1875),总理衙门组织大臣讨论海防,郭嵩焘乃呈上《条议海防事宜》。尽管已经蛰伏数年,年近六旬,但郭嵩焘依旧锐气十足,从文明转型视角出发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变局观。

一方面,郭嵩焘最终完成了对西方文明的定位。他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之一节也”^⑦。通过这一论述,他超越了将西方文明视为“异学”“杂学”与末流的传统观点。^⑧他指出西学也有其“本”,即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逻辑;又指出“本末”应当配套,意味着中国只有学西方之“本”,方能实现学西方之“末”的目标。

另一方面,郭嵩焘指出,中国不可能依靠战争解决与西方之间的矛盾。西方侵略中国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如虎将噬”,将会速亡中国,而是“如附骨之疽,攻之不能去也;如狐虻之凭于人,执而求之,又不可得也”。^⑨郭嵩焘的论述隐含的意思是,欲改变西方文明影响力深入骨髓的现实,恰恰应当从中华文明的本质性问题出发进行改革。中国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去弊求速,立志求坚,任贤求专,收功求缓”,而非试图恃所谓军力增强而毕其功于一役。

由以上论述可见,郭嵩焘的变局观在其于同光之际复出时已经完整形成。郭嵩焘将大变局上升到中华文明存亡继绝的高度,这也奠定了他在后世被视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早期代表人物乃至“先知”的历史地位。^⑩而出使西欧的经历,显然使郭嵩焘的文明转型变局观更为坚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铸就了他影响最大的作品《使西纪程》。

①《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页。

②《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393、401页。

③《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469页。

④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52页。

⑤李欣然《处变观通:郭嵩焘与近代文明竞争思路的开端》,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9-110页。

⑥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71页。

⑦《条议海防事宜》,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⑧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⑨《条议海防事宜》,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⑩例如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受任出使英国大臣,自上海启程赴欧,随即开始写作日记。应当注意,晚清使臣的日记并非私人作品,而是官方布置的任务,有利于朝廷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状况,同时对使臣进行控制。正如郭嵩焘自己所言,“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①。因此,在漫长航路中,郭嵩焘对沿途所经地区开展考察,秉承开放的心态与同行西人就西方之历史与现状广泛交流,将了解到的情况与自身丰厚的历史知识相结合,创作了《使西纪程》。^②亲身体验令他感慨西方文明的源远流长,更加看清了中西关系的前所未有“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西方国家“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③面对与中国一样有深厚文明积淀的西方国家,郭嵩焘进一步强调,中国应对大变局当采取守势,以求和为主,决不可意气用事,轻易启衅。他认为,在南宋之前中原王朝都能“以大事小”,并不以此为耻;而自南宋以后,“峭急褊迫”的主战派“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终置自身于“无地自容”之境。而今日之清朝,也有人说出“宁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之语。这种“虚骄以自张大”的“高谈阔论”,不利于中国在大变局下生存与发展。^④

《使西纪程》虽是日记,终究还是要刊载的正式文件,郭嵩焘在其中的言论还是有所保留。在私人色彩更强的日记中,他的言论则显得更加透彻和悲观。欧洲国家大都会的欣欣向荣,令郭嵩焘进一步认定西方文明在道统上的优势,指出中西三十余年交通,西方“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⑤。郭嵩焘将中国的治道归为自上而下的君道与德治,即“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与之相对,西方的治道是自下而上的民道与法治,即“西洋以公之臣庶”,“西洋治民以法”。然而,有德之君不能持续出现,民众的力量却能“推行无穷,愈久而人文愈胜”。传统中国强调的圣贤之君、天下大治的治理模式,在大变局中已经走不通了。这也使得作为儒士的郭嵩焘,在一番推论之后,却不得不否定儒家心目中的上古三代理想社会“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⑥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亲身体悟,甚至使其得出了中国已经“失道”、自外为“夷狄”的观点“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西方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⑦郭嵩焘在大变局中从文明转型的视角出发,所产生的对中华文明的怀疑,乃至趋西尊西的价值取向,虽于日后的中西“学战”之中渐趋增长,但在他所处的时代无疑尚属离经叛道。^⑧郭嵩焘出使之前,即有人讽刺其“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当郭嵩焘明白无误地承认中西文明的优势地位已经发生逆转时,统治者和士人自然对其更不见容。于是,郭嵩焘被从七万里外召回,从此再未复起。但即使是再次回乡闲居,郭嵩焘也从未停止对国事的思考。^⑨“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这位“数犯天下之大不韪”却仍然“侃侃言之,一无顾忌”的老臣,从来不曾改变自己的观点与判断。

三、薛福成之出使与对大变局的“权力竞争”思考

郭嵩焘是今日耳熟能详的洋务名臣们的同辈之人;与之相比,薛福成只能算是“门下晚生”。^⑩他一生中有十七年时间是以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宾的身份度过的,贡生出身的他性格也较为平淡,在传统士大夫的等级体系中完全无法和中进士、点翰林,号称“芬芳悱恻”的郭嵩焘相提并论。然而,在传统人才选拔体系被打破的晚清,薛福成因机缘会走上了与郭嵩焘相似的位置,也留下了与郭嵩焘恰堪对照的以“权力竞争”为核心

①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80页。

②如船抵埃及,郭嵩焘即联想到《班超传》中提到甘英通大秦,抵达安息、条支之逸事,说明他对古今地名的变迁有深刻的理解。参见《使西纪程》,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③《使西纪程》,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9页。

④《使西纪程》,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⑤有学者已经指出,受到时代与眼界的限制,郭嵩焘所描述并据以立论的西方社会只是当时西方的上流社会,而未见西方下层民众所遭受的压迫。参见钟叔河《论郭嵩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⑥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26-627页。

⑦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91页。

⑧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4页。

⑨例如在其晚年所作的《因法事条陈时政疏》中,郭嵩焘仍然对中西之间的战和问题提出坚定的主和意见。参见《因法事条陈时政疏》,陆玉林选注《使西纪程——郭嵩焘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⑩薛福成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合称“曾门四弟子”。有关该说法的流变,参见范丹凝《“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的思想体系。^①

薛福成早年的成长环境已经艰险地卷入了大变局之中。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对其故乡无锡造成深刻冲击,薛福成无意像前人那样在“时文、试帖、小楷”的科举体系中度过一生。同治四年(1865),他投入曾国藩幕中,选择了一条更加经世致用的道路。如前文所述,在向曾国藩递交的进身之文《上曾侯相书》中,薛福成已然提出“大变局”概念,并详尽阐述了自己对大变局的思考。此文虽然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但已可看出薛福成变局观的思考方向。薛福成指出,应对大变局的策略“有体有用”。其“体”乃是为政以德,但这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所强调的,是通过购置西方兵器以强化海防,利用列强的内部矛盾与在华利益对其进行分化瓦解,以及对鸦片进口克收重税从而渐次达到禁止等具体的政策手段。^②在薛福成的思考路径中,文明与道统的问题虽然存在,但他主要的关注点,是在变局中缩小中西之间的权力差距。早年的志趣,在薛福成一生的思考与实践中的是一以贯之的。

同光之际,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也进一步发生深刻演变。在海疆,日本寻衅侵入台湾,并将琉球“废藩置县”;在陆疆,左宗棠用兵新疆虽然取得成功,但钦差大臣崇厚擅自签订《交收伊犁条约》,使清朝在外交上陷入困境。面对新一轮边疆危机即将爆发的严峻局面,薛福成创作《筹洋刍议》,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了全面审视与反思。

日本与俄国在中国边疆用兵所带来的压力,使得大变局的性质发生演化。两国近在中国“卧榻之侧”,势将取蚕食鲸吞之势,对中国主权与领土所带来的直接威胁更甚于欧美列强。针对这一状况,薛福成更加明确地将权力的增长视为中国在大变局中自救的关键,强调以自强为根本,并适当引入外援以应对现实局势。薛福成特别指出,西人的公私观念使其在办外事时,将“交际”与“交涉”判为两途。因此,中国外交官与西方外交官来往时,也应“让以虚而不让以实”,遵守外交礼仪,讲究外交技巧,但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③他还特别重视财政资源对中国在大变局中实现自强与自主不可替代的意义,指出在“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竟事通商”的时代,中国必须发展工农业与交通业以求与西方竞争。鉴于当时的协定关税制度使得清廷损失了一项重大税源,薛福成提出以厘金收取维护自身财力基础,支撑边疆战事开销的策略。^④此时的薛福成已经看清了西方现实主义政治秩序中的权力逻辑与自助规律,并且试图用物质性的国家利益取代天朝秩序特别是朝贡羁縻的“面子”,促使清朝融入主权国家外交的历史潮流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筹洋刍议》之《变法》篇中,薛福成还从大变局的视角对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评论。他指出,大变局已经使世界局势由“华夷隔绝”变为“中外联属”,这是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有的新局面。“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推动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改革势在必行。然而,薛福成强调的改革仅针对所谓“流弊”,即传统文化中于中国自强与自主有碍的颛顼保守部分,至于没有弊病的部分,则“虽万世不变可也”。薛福成进一步论证,开展洋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仅不会“用夷变夏”,反而可为中国的道统增色。西方只是在科技研究中“偶得风气之先”,没有理由认为西方会永远独占科技研究之鳌头。因此,应当借助西方的“器术之学”实现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平等,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中国的道统传播到四方。事实上,洋务的最终目标是“用夏变夷”。^⑤由此可见,在薛福成的变局观中,西方文明的冲击虽然足以对中华文明构成挑战,但无法触动中华文明之根基,中国也没有必要放弃或改变自身文明的内核。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竞争,最终目标是以中国权力的增强保卫与发扬自身道统。

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受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出使西方的经历,使得薛福成的变局观进一步深化。他认为西方的富强根源在于“养民、教民”,即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自己早年所强调的“精制

^①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概念的定义多元,围绕权力本质与特征的论争几乎与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同步。本文强调的权力主要是指一国决策者运用物质性资源,塑造或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关于国际政治学科中权力概念的更多论述,可参见陈志敏、常璐璐《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

^②《上曾侯相书》,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5页。

^③《筹洋刍议》,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8页。

^④厘金,即清政府为筹措军饷对国内贸易所征收的道路费与交易费。根据学者的估计,光绪年间,清政府每年收取的厘金在库平银2000万两以上,构成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参见周育民《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⑤《筹洋刍议》,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0页。

造、利军火、广船械”等只是表现形式。^①他意识到商业“握四民之纲”,发展商业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他不拘泥于经书旧说,认为即使圣人复生,在全球交往日益密切的时代下,也必然会讲求商业、重视经济。^②他特别着意观察西方政治制度,不排斥用西制改造中制。例如,他建议用西方外交体制中公务员久居其任、不轻易调动的制度改造总理衙门的储才与培养机制,选拔一批长期从事外交的人才。^③他甚至曾更为直白地通过对比中国周边国家采用西洋制度前后的不同,承认“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④。

然而,薛福成对于西方具体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肯定,始终没有全部转化为他对西方文明的肯定,更没有促使他产生西方文明高于中华文明的观点,其中的典型案例体现在薛福成对君主制与民主制关系的论述之中。他通过对西方政体的考察指出,民主国家政治开放,人人平等,但朋党角力,相互争胜;君主国权力集中,如有贤明君主,足以立功立德,但君主制下人民被驱使,上下情势不通。由此,他指出了两条政体改善之道:其一是“得其人”,无论何种制度,只有贤人当政,才可达到良政善治;其二是建立君民共主的“混合政体”,如英国与意大利的君主立宪制。但是,在上述真知灼见的基础上,薛福成将君民共主政治的发源归于中国上古三代以及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⑤与郭嵩焘将西方“拟于三代”的思路相反,薛福成认为当今西方的政治与文明虽然优异,但在中华文明传统之中同样能够找到根源。薛福成还指出,中国实施洋务以来国际影响力已在不断提升,逐渐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因此,中国不应妄自菲薄、讳疾忌医。^⑥中国的道统仍然具有优势,应在正视与西方的差距、提升自身权力的基础上寻求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振兴。

为宣扬中国道统的生命力,薛福成甚至进一步提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的观点,比出洋前的“用夏变夷”更进一步。^⑦薛福成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实乃“中国数千年来所创”,西方“袭而精修之”,方才将其发扬光大。因此,大变局只是中西科技优势地位的一次暂时转移。中国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在西学基础上复兴中学,“再辟造化之灵机”。^⑧

在洋务运动盛期,如薛福成一般主张所谓“西学中源”的观点为数不少,但薛福成的论述不仅数量较多、涉及的议题丰富,而且态度也更加坚定。^⑨这种观点或许既是薛福成基于自身知识与价值体系的推断,也是他避免重蹈《使西纪程》覆辙,巧妙为洋务运动鼓与呼的宣传手段。^⑩但无论做何种理解,这一观点均体现出在薛福成眼中,清廷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明秩序在大变局中有机会自存甚至更进一步取得优势,而其关键在于保持并增强中国在面对西方时的权力。

四、郭嵩焘、薛福成对大变局的观点比较

郭嵩焘与薛福成在思想上有惺惺相惜之感。郭嵩焘曾因薛福成向光绪帝上呈《使西纪程》而赞许其为“有心人”。^⑪薛福成则赞许郭嵩焘公忠体国、力排众议的执着与勇毅,认为其地位仅次于曾纪泽,可居于当时中国驻外使节第二名的位置。^⑫二人思想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承认西学有体有用,西方文明根基深厚,权力盛于中国,大变局下的中国应当向西方学习,通过变革以实现自存。然而,两人个性与生活经验的差异,导致他们在同时面对大变局时,发展出两类不同的观点。郭嵩焘倾向于从文明转型的视角思考大变局,中国能否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实现自身文明的转型,是在大变局中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薛福成将大变局视作东西方的权力竞争,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物质层面的自强,并充分吸收西方外交手段与政治制度中的可

①《〈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8页。

②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7页。

③《〈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④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170页。

⑤《〈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124页。

⑥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⑦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跋”,第3页。

⑧薛福成著,安宇寄校点《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68页。

⑨丁凤麟《薛福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

⑩朱维铮认为,薛福成提出此类“怪论”是不想贻讥清议,同时他的观点也为后世的“格致古微”和“托古改制”之说提供了养料。参见朱维铮《晚清的六种使西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⑪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680页。

⑫《〈出使日记续刻〉节选》徐素华选注《筹洋刍议——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取之处以缩小自身与西方之间的权力差距,则可以在不触及文明根源的基础上实现对大变局的应对。

具体而言,郭嵩焘可以被称作“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理想主义者特指将文明、道义等因素作为国际政治驱动力的政治家或学者。^①在郭嵩焘的变局观中,西方在权力结构上的优势与主导权是表面现象,其本质是西方在文明演进中发展出高于中国的道统。中西文明的差距,使得双方的竞争缺乏妥协空间。传统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不足以支撑中国救亡图存的事业,中国势必向西方学习,实现文明的基础性转型,否则将难以摆脱沦为世界边缘地区和被西方支配的命运。基于此,郭嵩焘为大变局下的中西关系提出的实践策略之核心是求和与自守。郭嵩焘认为,彼时的中国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基础性的国家社会建构上,都不足以与西方一战,故而必须重视保持和平的局面,以争取喘息与发展的机会。

与郭嵩焘相对,薛福成可以被称作“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他重点从权力竞争的角度看待大变局,这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近。^②薛福成认为,中国真正应当向西方学习的是提升国力与娴熟运用外交、军事手段的方式,为此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局部调整,但不应将中西之间的差距上升到文明差距的地步,更没有必要以西学改造中学。薛福成在总体上仍然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存续能力,认为引进西方科技、制度的意义在于捍卫传统文明的内核与道统。从他尊奉的“西学中源”之说出发,甚至可以说他认为中学较之西学仍具有优越性。在实践策略的层面,薛福成从其变局观出发,主张在了解列强内部状况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的、不排除使用硬实力的斗争。

表1 郭嵩焘与薛福成的变局观比较

	郭嵩焘	薛福成
对中西文明格局的看法	文明转型是大变局的关键,中华文明相较西方已经落后,需要调整	尽管西方文明具有深厚渊源,但中华文明仍具有优越性,甚至可称“西学中源”
对中西权力结构的看法	中西之间之所以呈现权力差距,本质是西方在文明竞争中领先,权力结构只是表象	权力结构是大变局的关键,中国真正应当向西方学习的是自强的方式与外交军事手段
对中国应对大变局策略的看法	必须重视保持和平的局面,采取守势,争取喘息与发展	在了解列强内部状况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的、不排除使用硬实力的斗争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郭嵩焘与薛福成的两种恰堪对照的变局观,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同光之际,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与洋务运动的成就带来了“中兴”的政治样态,现实政治与学术的交织,使得“西学中源”之说有了市场;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西学中源”淡出主流思想界,但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直至五四运动之后,象征现代化的西学才相对于中学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因此,尽管郭嵩焘被后世之人称为“先知”,其文明转型的变局观被历史的进程证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在晚清比薛福成的权力竞争观点更加准确。应当承认,历史,尤其是思想与文化,毕竟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不可能出现突然断裂。因此,郭嵩焘预言西方文明将深刻改变中华文明,也无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反事实推理”的研究方法来看,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与收复新疆的成功,无疑足以让洋务派执政者和以薛福成为代表的实干家相信,外交之术与军事力量的增强可以在大变局中维持清朝的统治,通过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的转型是可行的。^③

郭嵩焘与薛福成的思想同客观现实之间的契合性,为当代的大变局研究留下了思想的母题。当中国与世界再一次面临大变局时,围绕文明与权力作用的辩论并未终止。两次大变局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受到冲击并做出反应的主体从中国转变为西方。当代西方国际政治思潮中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即蕴含着文明转型变局观,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异质性文明将导致西方文明主体地位的衰微。^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则蕴含着权力竞争的变局观,指向中国的权力增长对西方国家国际地位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⑤

相应地,当代中国学者对大变局的应对方略,总体上也可以从文明与权力两种视角进行分类。强调文明

①参见俞沂暄《国际秩序转变背景下的威尔逊主义:起源、政策和影响》,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

②关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可参见[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8-130页。

③关于“反事实推理”,参见[英]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0页。

④关于当代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内容及批判,参见邢丽菊《中美应保持和加强人文交流》,《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

⑤[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页。

视角的研究者认为,文明间的关系是大变局的深层次结构,应当通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承认多元文明与多元现代化路径的存在,化解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风险,塑造更加稳定的国际格局。^① 强调权力视角的研究者则倾向于认为,中西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大变局的根本特征,所谓文明与价值观的冲突只是权力转移的结果。化解变局挑战的关键是以中国权力的提升为基础,通过对权力的高效与巧妙运用,引领世界秩序转型。^② 这两种声音仿佛同郭嵩焘和薛福成的思想“隔空对话”,预示着源自十九世纪末的基本问题意识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仍未结束,依旧是值得探索的时代性命题。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见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③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上,从思想史路径和中国视角对大变局开展本体论层面的研究,无疑有利于增进对大变局的本质特征、历史脉络,中国与大变局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大变局中的战略选择等重大问题的理解。郭嵩焘与薛福成两位晚清驻外使节的比较,呈现出文明转型与权力竞争两种变局观背后的深厚历史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中国知识体系视角开展当代外交学研究的具体尝试,有利于深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的理解。

首先,大变局具有多义性,应当同时重视文明与权力两种路径的重要价值。如上文所述,郭嵩焘与薛福成对晚清大变局的判断并无对错或价值高下之分,他们的思考在不同时代得到发掘,折射出社会思潮多元范式交替的特征。^④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势必体现出文明与权力之间,乃至其他更多视角之间的复杂交织与相互影响,在进行分析时应避免执其一端,不及其余。

其次,大变局具有长期性,不应低估大变局背后转型的艰巨任务。郭嵩焘与薛福成站在大变局的起点,虽代表了晚清较高的认知水平,但仍然难以预判大变局最终的结果。当代的研究者同样应当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如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克服认知的局限性,谋求对大变局未来演化趋势的准确预判,有待学术界做出更多贡献。

再次,应当重视大变局的目标性,积极论证中国“平视这个世界”的方式。^⑤ 郭嵩焘与薛福成的变局观揭示,自晚清以降学人便提出中国在大变局之中具有主体性,可以塑造大变局的目标。但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构想的目标仍然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带有文明优越或权力强制的色彩。欲在当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建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在文明领域交流互鉴、在权力领域平等互利的关系,需要政治家与学者的胸怀和识见。

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史研究并不必然达成封闭式的结论,而是努力提供一种开放的问题域与思想路径。尽管国际关系学常被视为一门日新月异、变动不居的学问,但其仍然需要摆脱现象、回归本质的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特别是思想史将为国际关系学提供重要的元命题,增益国际关系学的本体论研究,因此应当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责任编辑:廖吉广)

^①例如秦亚青《百年变局与新型文化间关系》,《世界知识》2020年第1期;王逸舟《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3-323页。

^②例如阎学通、徐舟《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1期;张蕴岭《“百年大变局”,变的是什么》,《世界知识》2020年第9期。

^③《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④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⑤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人民日报》2021年3月7日第1版。